

# 《诗经·风》与广西山歌的转化对接

## ——读宋安群新作《天魅地香》

□ 聂震宁

风》与新民歌的古今交响》(以下简称《天魅地香》),而这次对民歌的研究他直抵中华诗歌最早的经典《诗经》。

《诗经》成书在先秦时期,而早在西汉就已经注家蜂起,异说纷呈,引起经学家们的不满,出人意料的是,大儒董仲舒却站出来容忍《诗经》的解读热,说是“《诗》无达诂”(《诗》即《诗经》),鼓励人们继续自由“解诂”——如此可以让“独尊儒术”更加热闹。自先秦以降,在这一理念下,解读《诗经》经典名著层出不穷。这些著作涵盖了从古代到当代的多种学术视角,既有经典注解,也有现代解读,体现了《诗经》解读的多样性、丰富性、时代性、训诂性、自由性、文学性……历史留存下来的文学经典,必然会越来越多,甚至还可以增加一个“田野调查”。

可是,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,宋安群别开了一个生面,在其《天魅地香》中,用当代汉语“七字四句头”广西桂柳方言风格民歌一山歌体,来翻译了《诗经·风》中的诗篇。尽管郭沫若先生说过,《诗经》“最有文学价值的是《国风》……《风》的价值高于《雅》,《雅》高于《颂》”而最具生活气息的是《风》,最具青春气息的是《风》,因而最能让读者感到愉悦亲和的也应当是《风》。可迄今为止,还没有人像《天魅地香》用广西民歌一山歌体来翻译那么多《风》的诗篇。

鉴于篇幅有限,我们不妨只取《关雎》第一章的几种译文文本,来做一次简单的翻译对比。先看《天魅地香》是如何用广西民歌来翻译的。

原诗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。”《天魅地香》将之译成:“洲上斑鸠叫咕咕,问妹有夫没有夫。妹是苗条好配偶,哥想娶妹共一屋。”

再比较当代几位著名学者的译作:  
“关关雎鸠和鸣,在河心小小洲上。好姑

娘苗苗条条,哥儿想和她成双。”这是著名古典文学专家余冠英先生的现代格律体的译作。

“鱼鹰关关对着唱,停在河中沙洲上。漂亮善良好姑娘,该是君子好对象。”这是著名文史专家周振甫先生七言诗体的译作。

“咯咯叫着的一对鱼鹰,落在黄河的沙洲上。善良美丽的好姑娘,是公子们的好伴当。”这是著名古典文学专家陈振寰先生现代自由体的译作。

可以说,名家译作各具特色,各有趣味。而《天魅地香》里的民歌体译作,由于在起兴、比喻以及叙述方式,还有地域色彩,语言特征等方面,更具广西山歌的元素,更有歌咏的特点,因而就更接近《关雎》的民间文学特性。进而去想,绝大多数专家都认为《诗经·风》是上古时期用来歌唱的诗歌,甚至有著名汉学家、德籍美国学者柯马丁也认为,《风》诗的生成符合民间文学民歌创作规律的体现。那么,《天魅地香》用民歌体来翻译《风》诗,实在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古今融合对接的尝试。

这种尝试让我们想起文化人类学的“田野调查”。“田野调查”涉及到语言学、考古学、民族学、行为学、人类学、文学、艺术、民俗等。对于《诗经》这一远古时期用来歌唱的诗歌,尤其是对于最能体现民间文学——民歌创作规律的《风》诗,用民歌翻译似乎更具有还原价值。

从《天歌地唱》我们了解到,宋安群收集有500多张广西山歌视频碟片。他从这开阔的民歌研究田野考察得到启示,发现《风》诗的生成与相关吟唱有关,因而提出不要拘泥《诗经》所有篇什都是“一人所唱的诗歌”之陈说格局。他主张细化分辨出某些篇什系多人演唱,确定演唱的主体及演唱分工,以此相应做出新的段落分截。如《风》中的《卷耳》《汉广》《匏有苦叶》等一些诗,作者以民歌创制、演唱特性及田野调

查来推演,得出了《风》中好些诗篇是有不同的人分工演唱的结论,独具创见。

例如,《卷耳》一诗,全诗分为四章,多有研究者发现其中第一章与后三章人物主体并不统一。著名学者傅斯年对此诗结构曾有困惑,认为“首章是女子口气,下三章乃若行役在外者之词,恐有错乱”。学术大家钱锺书先生则解释为“花开两朵,各表一枝”,第一章写妇人,第二章开始则是写丈夫。钱先生虽然切准了叙述内容的变化,初步解了傅斯年的困惑,但他只“知其然”,讲透了“各表一枝”,可并没有讲透其“所以然”。宋安群从民歌创制的田野调查得到启发,得出结论,指出这是一首如同广西山歌男女对唱的浪漫情歌,也是一首庙堂里的祭祀歌。唱歌的主体分为两方,一方是由女子主唱,另一方是由男子主唱。祭祀礼仪和祈祷气象就由他们营造出来。

如此等等,书中这样的发现和解读还有许多。这种还原,也许更接近《风》诗格局的原义,是宋安群得到当代广西山歌田野调查的启发,从而生发出来的判断。

我们经常都在谈论如何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、民族精神,试图讲述民间文化的精彩、民族文化的自信,倡导优秀传统文化与古今文化的继承、融合、对接和创新,这都是时代呼唤的宏大叙事的命题。宋安群的《天魅地香》,以及《天籁地声》《天歌地唱》,以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响应时代的需要,印证、阐释了古代《诗经·风》和当代广西山歌的趣味、价值和意义,使之成为一部面向青年读者的普及型的《诗经》文化和山歌文化的通俗读物,也称得上是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的一次很有意义的实践。

(作者系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原总裁、中国版协全民阅读工作委员会主任)

# 在荒原上种玫瑰

## ——壮族盲人女作家蓝野针散文读后

□ 孙召玲

尼采在《偶像的黄昏》中提及,“那些杀不死我的,会让我更强大。”这句话像一柄利剑刺穿苦难认知的迷障,揭示创伤经验与主体性生成的辩证结构。当命运将蓝野针逐入黑暗荒原时,她完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自我超越——通过主体意志的抗争与亲属伦理的救赎力量,于文学创作中实现诗意的栖居,重构生存范式。这既是对宿命论的突围,亦昭示顽强意志在永恒轮回中的狂欢,彰显出生命哲学最深邃的悖论:正是在生命之重与生存之轻的张力中,人类实现自我超越。

蓝野针双眼罹患视网膜血管瘤与视神经萎缩,且视神经上另有一瘤。她历经多次治疗,包括手术与专业眼科医生的会诊,但视力始终无法恢复。“2018年6月,是我在深圳的最后一次复查。走出诊室的那一刻,心底一片冰凉,因为医生也救不了我,从今以后我的余生就要在黑暗中度过了。”医学判决带来视觉的黑暗,流水线女工的身份随之瓦解,母亲的角色出现功能性缺失,存在根基的符号体系在瞬间坍塌。蓝野针曾是一个普通的流水线女工,肩负着家庭的经济重担,但失明后,她不仅失去了工作能力,还成了家庭的“累赘”。“十几万的债务,嗷嗷待哺的幼子,再加上一个双目失明的妻子”,丈夫罗先生不得不独自扛起重担。债务的重压使蓝野针陷入自我贬抑,身份的剥离与经济的困难,将其推进精神与物质的双重绝境。作者最终选择“顺应命运的洪流”,但这绝非被动妥协。从“切菜时不知道切了多少次手”到“煮饭做菜都能顺利煮熟”,从依赖婆婆买菜到“带着孩子去县城”,她将肉体的疼痛转化为存在确证的仪式。蓝野针通过驯化身体重建生存秩序,将生理缺陷转化为存在支点。当她能熟练操持家务时,伤疤不再是失败的标记,而是黑暗荒原上含苞的玫瑰。

在存在论与美学的双重维度中,极端的痛苦经由意志的转化往往迸发出惊人的创造力。蓝野针以文字的镌刻完成对宿命论的解构,将失明这个看似永恒的诅咒锻造为文学创作之火,在词语的炼金术中重构光明。当社会机制惯性地将盲人困囿于“脆弱”客体的认知图式时,作者通过三重维度的超越性实践,完成了对既定秩序的优雅颠覆。首先在经济场

域的突围中,她以自由撰稿与平台签约建构起独立的经济人格,击碎弱势群体依附性生存的世俗想象。生存方式的革新意味着物质层面的自足,昭示精神主体性的觉醒。其次在叙事层面,蓝野针以感知超越视觉主导的话语,通过听觉的震颤、触觉的绵密与嗅觉的隐喻,构建起非视觉感知中心的“超人”叙事范式。于碎片书写与寻亲纪实的深度叙事中,实现了从“被叙述的他者”到“叙事主权者”的转换。更深层的超越发生在存在论范畴。当文字化作穿透黑暗的第二瞳孔,命运馈赠的创伤经验——暗夜中的触觉漫游、幼子滚烫的皮肤记忆、父亲守望的时空褶皱等等,都在语言的坍塌中淬炼为永恒回归的象征体系。每一次记忆的复调书写都是对宿命论的重构,每个词语的选择都是对创伤经验的赋形与超越。这种创作超越了简单的符号劳动,升华为传递存在意义的仪式。蓝野针在寻亲者破碎的生命图景中植入希望的光子,在私人创伤中开掘人性矿脉,实为践行尼采“价值重估”的哲学命题。将世俗认知中的“缺陷”转化为创造的原点,把生理的局限转化为认知的飞地,最终在语言的星丛中完成对光明本质的诠释。颇具吊诡的是,视觉感官的阙如反而催生了精神触角的超常敏锐,蓝野针在史铁生与张海迪的文字磁场里完成跨时空的精神共品。

作者的上述蜕变与超克,深植于亲属伦理的滋养与支撑之中。在医学理性宣告治愈无望之际,亲属以原始而炽热的情感力量,构筑起一道抵御外在异化的精神屏障。基于丈夫沉默的守护,儿子“妈妈是骄傲”的宣言,姑婆跨越山海的固执关怀,以及大姑小妹无微不至的帮扶,蓝野针窥见超越的可能性。在《黑夜里的提灯人》中,大姑小妹不辞辛劳,往

返城乡之间,送来生活必需品,甚至在搬家到县城时,帮助她熟悉环境,安排好孩子的接送事宜,二者的无私付出,让蓝野针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和力量。姑婆则以一种近乎原始的信仰,拒绝接受医学判决的终局性。其翻山越岭送母鸡、偷偷塞护身符,如是之“蒙昧”的行为和未被规训的生命直觉,为作者的超越之路提供了心灵维度的支撑。需要留意的是,在《祝福》《活着》《人世间》等传统家庭叙事中,母亲常被塑造为保护者角色,但蓝野针笔下“孩子牵着盲母前行”的场景,颠覆了健全——残障的二元结构。亲子关系倒置打破既定秩序,释放出更强大的生命能量。大儿子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任,学会做饭、打扫卫生,帮助母亲处理各种生活琐事;小儿子“我妈妈吃你家大米了吗”的诘问以稚嫩逻辑反驳歧视,维护母亲尊严,完成了对世俗价值体系的解构。

家庭的支持虽为蓝野针提供了精神庇护,她仍需直面现代社会的结构性矛盾。蓝野针的经历无意间成为审视现代性的棱镜,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剖析角度。作者在文章中无奈地发出“只有在大城市盲人才有更多机会”的感慨,揭示技术红利分配在城乡之间所呈现出的显著差异。智能手机、读屏软件等现代发明本应成为实现技术平权的利器,然而在农村环境中,这些技术却沦为一种“特权”。蓝野针需要依赖年仅十一岁的儿子协助安装调试软件,甚至因电脑版本过低而无法使用基础功能。城市预设的“无障碍”设计在农村场域中失效,暗示现代技术并未真正突破地域阶序的壁垒,无形中加剧边缘群体的生存困境。反复出现的“麻烦”自指,如“现在我本身就是一个麻烦”,也在一定程度

上无情地暴露了效率至上的现代社会对非常规生命形态的排斥。规整化的体系对残障者的隐性压迫尤为典型。蓝野针在为孩子注册学校时焦头烂额,因迷路导致孩子在校滞留,表面看似中立的行政流程实则暗含“正常人”的身体预设,残障者不得以额外的成本适配整个系统。这种“温柔暴力”比显性的歧视更具侵蚀性。蓝野针的生存抗争呈现出技术驯化与情感联结的辩证性。她将现代工具巧妙地转化为“生命武器”:网络写作突破了物理限制,使失明者通过文字重建了主体性(“把自己活成一道光”中泰戈尔诗句的引用,彰显了这一深刻意蕴);视频指路消解空间障碍;在线辅导打破知识垄断;苏予老师的私教班拓宽弱势群体的学习路径。

由此可知,蓝野针的生存策略并非依靠蛮力对抗命运,而是在承认自身局限性的基础上,凭借强大的意志力重新赋予技术新的语境。她拒绝盲人按摩的职业宿命,选择网络写作开辟自己的“盲道”,以弱者身份建构技术逻辑自我。读屏软件与家族亲情耦合、写作平台与助人伦理交织,技术便从冰冷的效率机器升华为生命意义的载体。她的经历表明,现代性矛盾的突破并不在于技术本身的先进性,而在于使用者能否将其转化为“存在的技艺”。这一生存智慧,为反思技术社会的异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启示。真正的文明、进步,需要技术的加持,更有待重塑技术与人性的共生关系。

总体而言,蓝野针正借助文字的力量,细腻地勾勒出诸多质朴而真挚的生命故事。虽然在内容的平衡性、社会背景与文化语境的深度挖掘等方面尚有完善空间,但她的叙事已突破“残疾——悲剧”这一传统模式,展现出更具张力的生命图景。蓝野手中的菜刀指向物质困境的破局,盲杖延伸为社会关系的触角,键盘则化作精神世界的凿刻工具。她在黑暗中抒写的“此心光明,亦复何言”,既是对视觉依赖的祛魅,更是对存在本质的叩问。这种将生理局限转化为创作势能的做法,犹如命运荒原的放逐者绘制玫瑰地图:通过文字拓殖的精神绿洲,折射出生命自我超越的璀璨光谱。

(作者供职于广西民族师范学院)